

王逢振 编译

电视 风暴

天津人民出版社

王逢振 编译

电视风暴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电视风暴/王逢振编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1

(法兰西学术丛书/王逢振主编)

ISBN 978-7-201-05202-1

I. 电… II. 王… III. 传播媒介—符号学—文集 IV.
G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9953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46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插页

字数: 130千字 印数: 1-4,000

定 价: 18.00元

目 录

电视风暴…………… 理查德·丹斯特 著 (1)

评《西北偏北》空间体系的安排设置

……………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著 (49)

电影上的身体:反常的移植

…………… 林达·威廉斯 著 (78)

“欲望与满足,一个黄金循环”:《双峰》中的魔力

与商业…………… 理查德·狄恩斯特 著 (103)

希区柯克式的娱乐癖………… 斯拉沃·齐泽克 著 (117)

无法显现的化身…………… 米歇尔·肖恩 著 (122)

叙述空间…………… 斯蒂芬·希思 著 (136)

电视风暴

理查德·丹斯特 著

电视可以供人娱乐,可以使家人聚集一堂,还可以消磨时光。这是商业电视的三大功能。

——意大利媒介巨子西尔维欧·帕鲁斯柯尼

正如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一样,电视也并非是从来就有的事物,它是一部在不断变化发展中实实在在的机器,又是各个工作零件的组合。从电视发明问世到生产到再生产,它的足迹遍布我们所知的世界许多地区。有一点可以确信,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也是在动态中前进的。无论他们以何种形态存在、何时兴起,其对世界的影响并非立刻就会被人注意到和加以理解。虽然“电视”这个概念要比“资本主义”、“现代性”(“后现代性”姑且不提)更为具体,但是实际上它们同处于一个抽象程度,同一种物质性范畴,进而,它们也都具有理论上的模糊性。其中每一个概念都是对一个令人费解、尚未澄清之对象的命名——或许这些概念还根本称不上是对象,而只是一些或然性的命题罢了——它们的进程、功能及范畴不能限定在合理论证的领域。基于这些概念整体上的抽象性,我们必须迫使自己的思维展开以至归纳组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整地为之下定义。由于当代理论

为我们提出了许多有关言谈、行动、表达和理解分析各方面错综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可能仅仅用一套单一的术语来定义电视,也不可能只把它当作一种时尚流行产品,或者干脆任其搁置在文字史中而不去细细考察。然而,如果理论问题能够使电视走出其谙熟的温巢(这种意识具有单凭经验确定事实,放弃意识形态的特点),那么,电视的形象或许会截然不同了。

为了整体上接近和理解“电视”,我们必须展开创造性思维,把头脑中的各种概念组合和重组,而这些概念有些是电视直接给人的印象,有些却不是。因此如果我们在电视上能看到一闪即逝的图像,那么,在其外就一定存在持久稳定的图像,但这也许是更难辨明的。^[1]我们该如何把电视在人头脑中的抽象轮廓转化为具体形象呢?通过哪些写作规则、修辞手段、表现手法或构思框架?电视能为我们带来什么而我们又如何得知?为了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将着手逐一了解历史上三个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以此来了解人们开始审视电视之前它的形象是什么样。而后,我将概述一下两套相关的形象,即学术形象和理论形象,及其发挥性的阐释,以便解决余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想象中的整体性

在对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和启蒙的辩证性等问题的争论中,电视呈现出了一种权力,这种力量甚至超越其节目本身,似乎仅仅其存在本身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产生了某种影响。人们也许还会记得:电视曾以其新生的权力迅速充斥了社会领域。但我们的问题并不是电视何时兴起,而是电视何时成了世界第二强势,何时电视用丰富翔实的图像传播手段代替了分散孤立的信息交流手段,何时电视不再仅仅充当两个远距离终端

的传播工具,而是开始建立一个根据自身程序来接收远距离图像信号,并对其进行重组,开拓了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自始至终。

电视早在产生之初,其目标就面向全球了。基于最初的图像传输实验,人们很快把电视节目想象成把世界浓缩在其中,包罗万象的影像天地。而未来的理想状态是,电视将克服不可逾越的听、说(收音机、电话)界限,展现出全方位的瞬息变幻的视野。摄像机的继电器和监控器将加快速度以至最终消除观众和实物之间的距离(那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的剩余部分,把重点放在了“观点”与“框架”两方面)。最早的电视强硬派支持者不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拒绝这种跨空间可视性的出现,因为它预示着双向的认可、信息的平等交换和发送及接收两端的即时平衡的实现,它将最终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绝对知识。^[2]本文就此希望援引鲁道夫·阿恩汉姆于1936年在伦敦写下的一段简明阐释,而当时伦敦的公共电视广播事业方兴未艾。

最初的水手和牧民开创了历史发展的先河,而包括电视在内的无线电技术则是这一进程中的尾声。人们离开故乡,穿越陆地、跋山涉水,交换各自的产品、发明和艺术品,并沟通了异地的风俗、宗教与知识技术。于是,欧洲的医生、传教士和教育者来到了亚非;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和黑人能够在欧洲大学就读;非洲的神像供奉在现代都市的起居室里,而黑人酋长也穿起了立领服装。而今天: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声音,正带着它的歌声、教诲和祈祷征服世界,传播四海,它使人类因广泛参与而紧密相联……无线电和电视的出现使任何人都能够同时收听、收看世界各地的

阿恩汉姆之所以如此褒扬广播事业,不仅是因为它扭转了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态势,即西方的宗教、教育及医学的文化输出只换回了外国用来装饰稀奇古怪的“神灵”之类的表层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带着对电视的憧憬,聆听广播之音,发现了一个新格式塔理论:仅仅以一个声音就能席卷一切,它无处不在,把世界带入一个从“局部”到“全体”的循环超越过程中去。虽然阿恩汉姆并未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电视为他的故事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并最终把我们带回到了一种存在的未知状态,这种状态可以追溯至原始散居的游牧时期。但当电视使我们心情平静时,我们应该说:让声像传播四方,世界将四海一家。

人们最初设想:电视将会带来国际间畅通无阻的自由贸易乌托邦,能实现帝国主义者特别是都市居民的地缘政治的雄心壮志。那时电视虽有普及天下之势,却也只有部分地区被纳入其网络,它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社团的普遍特征——乐观向上,崇尚自由。这种原始印象,被人们如传承遗产一般沿用发扬,一直影响着电视后来的发展。诚然,电视发明史上的每一次转折,都使之形象更为丰满和完善。对我们而言,不能把技术进步和最终应用、发展技术两者割裂开来,因为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有人还设想:电视的发明是用来传输图像的,甚至就在这种简单的假设中也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思考:“图像”是什么,“传输”的用途何在,以及哪些“对象”将会涉及在内。我们需要对电视的创新拟定一份文字草案,其中强调对电视所反映真实情景的真实再现,并且由于播放电视,使两地信息的即时互动成为了可能,因此这一点要求得到人

们的认可。更确切地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不断增加播放和接收电视的场所从而使之遍布各地,使之难以计数。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能把屏幕中的光影看作传输的图像,从而承认世界可以在同一规则及进程下协调发展的话,这一过程将会一蹴而就。

电视具有明显的设想和界定抽象整体性的能力,这一点对那些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人们并不陌生。在阿恩汉姆发展以上观点的 11 年前,原苏联虚幻派导演齐格·维特文就已预言到电视(“可视收音机”)本身能够反过来把交替发展的世界经济推向共产主义阶段。

技术在飞速向前发展,人们发明了通过无线电波放送图像的技术并发现了利用电影胶片记录声音信息的方法。

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有能力做到:通过附有无无线电发射装置的电影摄像机,把图像和声音信息放送到整个世界。

我们现在就必须做好准备,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明创造转化成推向其灭亡的工具。

播放歌剧、戏剧并非我们发明可视收音机的主旨。我们将时刻全心准备着,为世界所有工人提供这样的机会:去倾听,去感受这样一个井井有条的世界;去倾听,去感受,并获得彼此的了解。^[4]

维特文把电视理解为两种截然不同进程(录制和播放)的组合。只有两者相合,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世界。摄像机拍摄到的“影像”在两个层面上追求其真实性。首先,由于电视把每个图像作为客观世界的产物呈现在人们面前,因此,每个图像都是

周而复始,延伸发展经济链的一个反映。其次,电视的任何两种主观映像之间必须被证实是确有联系,即一种互动的有形关联,这种关联不在于映像的“内容”,也并不基于表现映像的句法手段,而只存在于主观映像系统本身,存在于不可分割的经济一体化世界统一体中。每次我们必须因循某种意识形态规则来“建立”两者的联系,而迄今为止,这种联系表现出了联结各行各业的法则,并独立预测出国际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两种想法之间的联系不仅设想而且规定了工人之间那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一种标准的列宁主义者有这样一种时髦的说法:电视将成为“电影加电气化”^[5],这是一个在辩证中前进的过程,在此进程中,对电视影像数量上的扩张,将会推动产生具有新特征、具有代表性的力量。

阿恩汉姆和维特文都看到,电视将会带来一个无拘无束的经济乌托邦(从这个观点来看,麦克卢汉只不过是他们在所处的历史时代过去很久之后,重复了电视出现前的观点而已。但当电视系统建立起来之后,很显然,当时的政府和私营企业并未急急忙忙将电视普及于整个社会领域。实际上,普及电视的方法是因国家不同而异,这取决于可用来投资制造电视机及制作节目的国有、私人资本的多少。怎样通过分布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最好地开拓和占领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从而启动广播系统,这的确是一个首要的战略决策。因为只有在这两个终端之间,我们才能调节和使用电视。发射与接收设施的最终布局及其关键性比例将会导致激烈的利益冲突,有时甚至会发展成为公开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这其中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我们根本不清楚如果将电视普及到千家万户,哪个阶层将会获益;其二是我们亦不懂得只有当电视无处不在时,它才会变得“完整”。

接下来要谈的第二个战略决策与普及电视的方法有关,以这种方法并借助图像的文本力量,社会生活的全貌将会在所有机器的协同工作下得以全面展现。

要想完成这样一个宏伟的工程,人们最熟知的技术是借助政府和文化权威机构的力量,因为这些机构现存的话语能够迅速宣告广播电视机构的创立。欧洲的电视事业,起初像广播事业一样,是作为政府的宣传工具出现的。因此,官方的意志是以一种优势文化的身份得以传达。在任何情况下,电视在履行政府功能和创造文化两方面总存在着矛盾,因为提供“公众服务”要求最大限度地面面俱到,而为了集中统一“公众要求”,人们会经常做一些“特殊处理”甚至采用独一无二的方法。一些专营公众服务的机构诸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国公关电视网一台、二台(ARD/ZDR),它们由政府来管理,有时还接受政府资助。这些机构因而被赋予了双重任务,即依照国家利益宣传发布信息及扩大人们对文化教育的需求量(这种扩大通常以全球化资本主义模式来进行)。由于这些机构长期以来受政府制约,因而如此折衷的办法同时阻止了官方文化与全方位私有及商业化文化的发展(以意大利为例,那儿的人们总是在这两种文化倾向间摇摆不定)。二战后,所有西方国家都坚持广播电视事业应兼顾服务公众与效力国家的路线,并一贯奉行为地方企业和私有企业产品的广告提供有限时段和折扣的原则。而与这些国家相对应的是俄罗斯和美国,它们超越了长期以来的折衷状态,开始根据各自的中央集权和商业网络模式追求电视的扩张。然而,随着其他国家加入电视集团,也随着旧成员国对其初始协议的重要协商,官方及私有模式之间的区别已逐渐模糊了。一言以蔽之,在广播事业不被政府简单管制的地方,其管理机构正与

国营、公营企业及地方企业、跨国公司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基于我们讨论的目的，以上所述“广播事业”一词包含所有依靠通信程序交流信息的事业）。由于广播事业表面上的这种杂合状态和它所具有的多种门类能够并存发展的前景，人们不会再设想电视会以一种直线、累积和透明的方式发展。相反，随着机器设备的进步，这种可视力量的威胁会变得更加毫无规则、充满竞争，同时也是人们优先考虑的发展对象。

但是，这种欧洲模式并非轻易就能输出到他国的。随着反殖民主义浪潮的层层推进，我们也得以有机会重新思考广播权威的地位问题。在 1961 年至 1962 年间，让·保罗·萨特在着手撰写《辩证理性批判》第二卷时，提出了一些笼统但颇有见地的观点，比如电视是如何使国家权力、精英文化与资本主义形式这三者极不相称地联系在一起的。电视事业在奉行戴高乐主义的法国和崇高革命的古巴只得到有限的扩张。萨特认真审视了这一问题，并区别了两种潜在的整体性思路：一个是意识形态思路，另一个是科学技术思路。这两种整体性思路不是沿着平行轨道前进以致最终必然地汇合在一起，而是在其前进的每一步上都相互影响着对方。在萨特看来，我们必须以一种辩证的方法来诠释电视，这种方法的实现要通过把具体设备与其运作之中的话语的关系完全割裂开来。起初，只要电视话语继续服从于阶级利益和业已建立的文化模式，它对公众的演讲模式就会引起争论，而且范围会不断扩大，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公众利益排除在外且只关注阶级利益。进而随着电视观众的出现，社会矛盾也就产生了。广播事业方面意识形态之所以未能迅速统一是由于技术应用不足造成的。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首要的解决方案就是发展科技，即生产更多的机器，从而填补社会中人

们思想上的鸿沟。

如果只有很少人拥有电视,那这似乎只是假定其自身处于整体性之中……而还有一部分人仍然看不到电视,与此同时由于整体性具有精确性,正如代表整体性所认同的条件一样。如果没有实际的分界线来划分这个领域的话,解决办法将会很温和。整个领域自己组织起来,全部装配上电视……而对于拥有者来说,公平代替了不公平,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看到电视了。〔6〕

但是萨特提出,这种解决方案会为最终的企业带来新的矛盾,物质上的整体性的重要作用已胜过为其存在提供合理性的想象中的完整性,电视开始展示出自己的合声“噪音”,而这声音的发出者是一个令人不悦的第三团伙,他们用的方言不再属于国家、民族,甚至也不属于虚假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文化。“电视的统一政策:做一些所谓意识形态的宣传,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统一是消极的,因此是按序列排列着。也就好比一些人总想说一些取悦于所有人的好话,但是所有人都不为所动,因此还是什么都不说为好。基于此,电视思想、电视行为等等也就随之产生了,这种现象属于哲学上讲的实践惰性。如此说法确实是既偏离主题又毫无意义的话语”(《辩证理性的批判》第二卷第 440 页至 441 页)。成套电视器材的发展影响到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使他们在更大系统范围之上重新组合起来,并成为其一部分。这些人类的个体不再依靠旧的文化习惯或共同规则互相联系在一起,既通过机器本身来建立这种联系,因而随着整个社会动力的僵化,陷入追求一种不可及的虚无状态,人类之间的积

极交流也被机器取而代之了。于是正如其他机器和物质系统一样,电视创造了一种“连续的”统一体,它能够使每个成员在它者的氛围中,同是相互联系又彼此分离。在这第二解决方案中,这个曾经服务于资产阶级文化的机器,现如今却背叛了其历史使命,从今以后开始我行我素,自成一家,产生了使人类的个体、群体、集体组织从外部面临着的文化力量,这将是他们注定的命运。^[7]

萨特在其《辩证理性的批判》一书中,对这些连续统一体的分析可谓细致入微。对他而言,连续统一体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间的逻辑关系。萨特恰当列举了下列问题用以讨论:无线电广播(作为一个消极的“间接引用”),自由市场(作为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和排行榜前十名(作为对普通民众喜好的综合表述)。^[8]这种“连续统一体”的概念清楚地指明了有关认同感与组织的一般逻辑:个体和客体都一样,它们对外部变化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连续统一体破坏了社会生活中的集体层面,迫使人们走向一种沉闷乏味的辩证综合性,围绕着事物性与它者性的空洞的要求去重新排列和重新吸收分散的行为。

但是萨特由此又把这个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即通过发展广播事业来打破这种连续统一体的可能性,他把这种可能性称为“古巴”,但是我们或许应该把它理解为萨特个人意义上的古巴。如果在电视的资本主义进化过程中,技术和阶级意识形态继续相互孤立、互不理睬的话,电视的动态变革应用将会为我们展现出另一种态势:为了迎合“大众文化”的要求,电视系统的规模将不断膨胀。换言之,虽然萨特表明这种“连续统一体”是设备不可避免的产物,但他仍然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当电视的

发展方向定位在大众文化的“整体公布”上时,各个群体在这种连续统一体中相互脱节的情况就能得以消除(《辩证理性批判》第二卷第440页)。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其基础在于不仅重新对看电视的条件进行安排,从而形成一些真正坐在电视机旁的群体,而且还要挖掘电视的潜力,吸引所有处在连续统一体上的个体和群体的加盟,将他们带入一个广大的共时体中;这将为未来的文化统一确定一个发展空间。对“大众文化”的分布普及,就是为整个国家激进的统一运动提供假设,“因此,为了做一个比较,你需要一个狂欢节,类似世界末日一样的重大事件,或者一些社会的动乱和剧变,比如一百万人聚集在一起等”(《辩证理性批判》第二卷,第438页)。统一一个团体当然远远不够,它只是聚集了连续的群体罢了。因而电视必须创造这样的统一综合能力,而与此同时,不至于使这种能力成为恒久不变的僵化目标,或是集体固有的形象,其结果是围绕着一个新的空洞从中心重新划分社会领域。在一个革新发展社会中,电视的职责就是占据文化的领地,而不是相反;即使是在创造一种新文化的过程中,电视也应当是踌躇不前,保持一种孤立局外的状态,并防止使其分布的法则凌驾于大众创造的实践之上。鉴于此,萨特把问题留给卡斯特罗来解决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它与《辩证理性批判》一书另一更大的两难推论正巧异曲同工,那就是革命团体如何保持与之血脉相连的革命动力,而使之不转化成为令人恐怖的体制化的权力。萨特发现,电视与人类一样都不具有压倒政治组织所言悖论的能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电视所能做的最多就是更多地普及电视,消解连续体单枪匹马驾驭文化的力量,根除由于电视供不应求而带来的市场压力和由电视传达出的意识形态中的精英思想,从而建立起一种与电视相关之完善的平

等、自由体系。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萨特,他对电视是否具有革命潜能存有疑虑,这是因为他对以下论断持怀疑态度:即使扩大电视的运作规模使其提高到发展国家文化、甚至引发阶级斗争的高度上,也不能透彻解析连续体和互融的群体之间存在的有待频繁论证的问题。电视似乎只提供一个政治话题——它是一个很现实的领域,达到了物质与意识形态的统一。然而没有哪个阶级、政党或是国家能控制这个过程的话语与结构。在萨特看来,电视最终将保留其最初的产品制造者的设计,其目的在于为下一代系列产品的生产提供指导,这种生机勃勃的新产品将面对新的挑战。沿着这条轨迹发展下去,通过这链条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最后电视要么改变要么被毁灭。

除了萨特相关论述的理论兴趣之外——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再次提到他有关经济和存在的观点——它还在此把我们引入了电视持续发展的简要叙事的尾声之中。起初,电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晶莹剔透的世界,而后,它就在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文化之间摇摆,并附着着他们的一些修饰语:“国家的”、“大众的”、“流行的”,最终其重心落在了市场急需之上。以上四种立场或观点,并不具有必然的历史联系或形式上的逻辑关系,反之,它们却提供了一幅展示电视机制与其话语之间系统联系的速写图。从某种意义上说,既然所有实际存在的电视系统都只是一个理想可视性的失败的综合体,那么,对比系统的任务就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展示出历史和想象的意识框架发展变化假设的类型学,目的是为了澄清各个系统之间的差别和张力。世界、国家、文化、市场,这些关键概念中的每一个都以其独特的方式组合成任何详尽描述电视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再现的准现象的领域,利益的具体系统和在现实空间中的具体的动用。^[9]虽然这其

中某一个组成部分好像要尽量避免受另外两个组成部分的影响,但是描述电视的每一种尝试都不可避免地要围绕电视机制、电视经济及其能力来展开论述。

电视带给人的每一个印象,首先都是由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在不同层面上迅速凝聚或处于分散状态而形成的印象。最终的平衡和抑制的结果使我们看到在各种各样理想的电视类型与电视的历史真实性之间鲜明的对比。举例来说,在观念及再现这一层面上,电视在世界意义上的形象保证了时间上的飞速快捷以及空间上的广阔无垠,而所有可能的主体与客体都在这时空之中彼此展现。但当电视推进其市场概念时,原来那种视觉上的广延性被一种可视的特性所取代,而我们对电视所具有看的总体态度开始变成了一种用来选择和消费的尝试性提议。以此观点来看,电视的概念作为全球信息即时快捷传输的代名词,似乎与社会科学家对错综复杂、形势突变的国际媒介市场所述概念的意义相去甚远。在一些地区,政府的干预将会在屏幕中显现;而在其他地区,文化讯息则反应着群体认同感与矛盾冲突。以上两种方式都暗示了其规模大小、组织形式及技术水平;政权主导电视和文化主导电视都可以被看作是以自我封闭的方式反对其他概念的限定性的策略。另一方面,一旦电视系统被全方位纳入其他系统之内,它就会使整个世界、国家、文化及市场的概念含糊不清,因为后者总是把其他系统引入到本身的适应范畴之内。读过以下文章后,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今天随处可见的扩张意味着电视正如其市场(地理电视)一样,其扩张是以牺牲所有其他电视概念的前途为代价的。